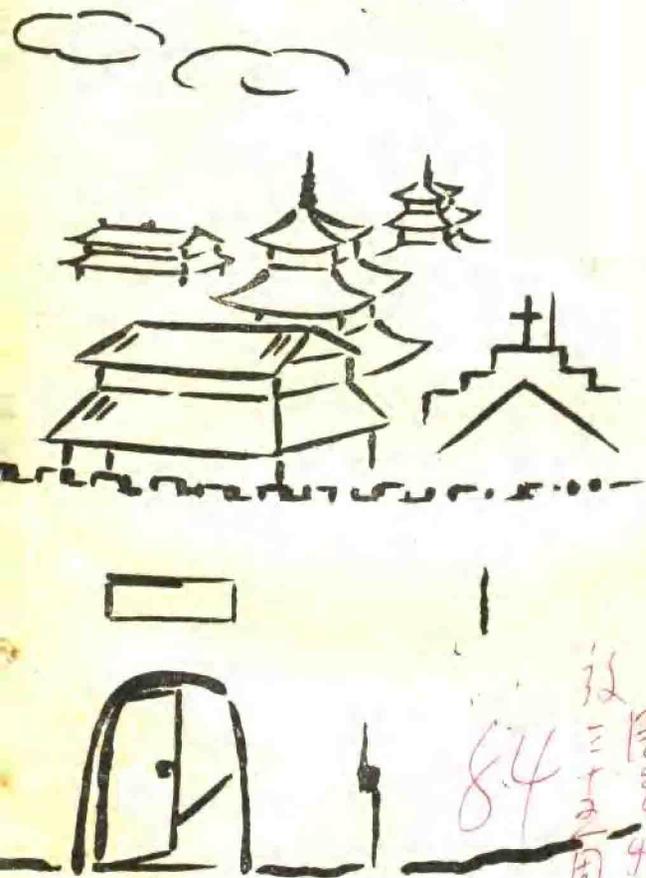


4/30 3

绥阳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（专辑）



84

周家沟绥阳所  
致三十五周年

张毅 10月23日

# 绥阳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（专辑）

yt112/16

政协绥阳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
绥阳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一九八四年国庆

# 目 录

- 绥阳县概况……………喻忠林、唐毅安(1)
- 绥阳县近百余年来历史初探……………陈兴仲(9)
- 近百年来绥阳几项工商业剖析……………王裔彬(39)
- 漫谈鸦片危害百余年……………罗悦明(66)
- 话旺草近百年来几项土特产品的沧桑……………杨林(69)
- 
- 解放前后绥阳县的交通运输状况……………郭荣(85)
- 绥阳县国营商业的起步和发展……………刘嘉麟(91)
- 回顾芙蓉大队三十余年来的历程  
……………大队支书任志明口述·杨林笔录(107)
- 郑场特产——梨·梨膏·柿饼……………王沐春(118)
- 温泉区二十年水稻良种推广概况……………李文翰 屈义权(123)
- 
- 让水沧桑二十年……………董绍兴(130)
- 让水的今昔……………罗谏(132)
- 后水河的变迁……………董绍兴(138)
- 芙蓉江水利工程……旺草水利站提供资料 杨林整理(140)
- 万里水库……………王沐春(142)

洋川河畔的战火

——吴元彪反清攻占绥阳之役

……………历史故事·杜世忠(144)

绥阳县近五百年来的自然灾害……………县气象站(161)

封面设计： 冯承章题字            刘家验画  
责任编辑： 陈兴仲      张为忠      卜宗学  
校    对： 刘家验

# 绥阳县概况

喻忠林 唐毅安

绥阳县位于贵州高原北部，大娄山山脉中段。东部与湄潭县接壤，南部毗邻遵义县，西部连接桐梓县，北部紧靠正安县。全县地理范围跨越东经 $106^{\circ}57'$ — $107^{\circ}3'$ ，北纬 $27^{\circ}49'$ 至 $28^{\circ}29'$ 之间。总面积2564.5平方公里，东西宽56公里，南北长74公里。大娄山山脉的余脉由西北蜿蜒而入，伸向东南面，遍布全县。县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。多属高原丘陵地带。主峰天门山，位于县北太白区太白公社，为县内最高点，海拔1802米(南天门)。最低处为太白区野茶公社麻塘村，海拔635米。全县地势平均海拔1000米—1100米左右。位于西北部的黄桷、宽阔、太白、温泉等地群峰耸立，山大坡多，峰岭相连，峡长谷深，沟谷交错，有古木参天的森林和绵延不断的林荫地带，有名贵药材天麻，有经济林木如桐、椿、漆、茶等。宽阔水天然林区，有大量的珙桐(中国鸽子树)、水青树、毛冠鹿、林麝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稀有动植物。位于东南部的洋川、郑场、旺草、儒溪等地，地势较低，起伏连绵的丘陵、山岭，间夹有若干大小不同的山间盆地及宽谷，河流纵横，沃野连片。境内大小河流，分布全县。主流芙蓉江，发源于黄桷，由西向东，横贯中部地带，流经旺草、温泉两区，注入正安县到四川省汇入乌江；东北部的清

溪河，源出宽阔，由西向北，经太白区，流入正安县境内；南部的双龙河，汇聚洋川河和八甲沟之水，经儒溪、郑场、东出遵义县；后水河源出大桥公社，经高坊子公社流入遵义四面山与板桥河汇合。县境内河流皆属长江水系乌江支流上游，这些河流汇聚山涧溪水，川流全县。河水流量一般不太大，但水源丰富，有利于灌溉。河流上游各盆地和坝子，大部份为第四纪冲积土。河床两岸为近代冲积土。境内地形复杂。山地多属石灰石岩溶地。山区坡陡岩悬，峦岫争奇；丘陵起伏不断、绵亘延伸；谷地沟谷交错，峡长、谷深；平坝宽阔平坦，连绵数里。

绥阳有许多自然奇观，形成风景名胜。如离县城三公里多的“神仙洞”（雅名“碧霄古洞”），为天然石灰石溶洞而成，洞深数里，洞中乳石成林，有石笋、石柱、石钟、天锅、流泉、形状毕肖，为“绥阳外八景”中第一名景，真是“石盘滴滴能成露，玉柱婷婷可捍风”。旧《绥阳县志》上记载：“城北七里许，有望霄山，山麓有洞名碧霄，中空数里，万象天然，据传时有仙子出入，每岁春节，游人如市”。前人有诗赞该景：“望霄山麓辟洞天，玲珑怪石古因原，游人怕惹桃花笑，处处相逢尽谪仙”；城西五里有一清泉，泉水喷涌而上，细密如筛，形成串珠，人们称之为“雅泉喷珠”；城西北二十里的“仙人山”海拔1309.9米，双峰对峙，婷婷玉立，双峰间有一大石坪，呈现一天然棋局，故名“仙岭棋局”；城东四十余里的小关山下，迭列三口水塘，水从头塘地中出，四时不涸，每日三潮，涨时水涌三、四尺，历时半时许水落，平静如常，美名“胜水三潮”；城南二十七里的“卧龙山”，为郑场八大庙宇中至今尚存寺庙，

山上林木葱郁，古木参天，环境清雅，每年春季，慕名而来的游观者，到此寻幽探奇；城西二十里的“螺江九曲”，一带碧流，九曲回环，登山俯视，惹人赞美。绥阳县名胜古迹颇多，据旧《绥阳县志》记载有八十多处，比较著名的有“绥阳外八景”和“绥阳内八景”，但由于时代变迁，生态环境的变化，人为的破坏，多数景致已名存实亡了。

绥阳县有史可考，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，至公元前八四一年，唐虞时代属古梁州；战国时期归夜郎；秦汉时期为夜郎且兰地。隋朝大业七年（公元611年）置阳明郡，辖绥阳县和高富县，绥阳之名始此。唐武德四年（公元622年），在绥阳县地（并非现今绥阳县）置夷州，领13县，洋川县为其中一县。宋置绥阳县，属播州乐源郡，即现今绥阳县。明万历二十九年（公元1601年），在原地仍设置绥阳县，属遵义军民府，知县詹淑，清建县城，于绥山脚下，洋川河畔取绥山、洋河之意名绥阳县，至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历史。清时绥阳县辖金里、朗里、旺里、赵里共四里四十甲。民国时辖七个区。解放后辖八个区一个镇，属遵义地区行政公署管辖。

解放前尽管绥阳县自然条件较好，可是劳动人民长期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身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，使绥阳劳动人民终年过着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的极端贫困的生活，经济、文化、交通都十分落后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路过绥阳，开仓济贫，宣传革命道理，虽在绥阳五天后即挥师北上，但在绥阳人民心中却播下了反封建、反剥削、反压

迫的革命火种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绥阳，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，把绥阳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，绥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获得了新生。随即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——绥阳县人民政府，辖全县7个区、19个乡镇。一九五〇年十二月，县里召开首届区书会议和县各界代表会议，布置了反霸工作，并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。通过清匪、反霸、减租、退押和土地改革等运动，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，巩固了人民政权。一九五三年根据发展的需要，调整为8个区公所，85个乡镇人民政府。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在绥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，选举成立“绥阳县人民委员会”。并将85个乡镇人民政府调为93个乡镇人民委员会。到一九五七年合并为53个乡镇人民委员会。全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，建立了1180个高级合作社。一九五八年成立8个农村人民公社，辖95个管理区。一九六二年恢复8个区，调整为60个人民公社。一九六一年后，逐渐沿革为48个人民公社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，经“毛泽东思想绥阳县革命委员会筹委会”酝酿协商，宣告成立“绥阳县革命委员会”。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，在绥阳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，恢复绥阳县人民政府。现辖洋川、郑场、旺草、儒溪、黄桷、宽阔、太白、温泉8个区公所，1个镇，48个人民公社，353个生产大队，3956个生产队，共有5049个自然村。

绥阳县地处亚热带，终年气候温和，夏无酷热，冬无严寒，年平均温度在 $15^{\circ}\text{C}$ 左右，历年最高气温为 $36.9^{\circ}\text{C}$

(1971年7月27日)，历年最低气温为零下6.9°C (1970年1月6日)；霜冻期短，无霜期长达246天——336天；雨量充沛，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164毫米，雨季通常在5月——8月间；土地肥沃，适宜农作物生长；风向以东北偏东风为主，最大风力7级；灾害性天气主要有暴雨、秋风和冰雹。全县总面积2564平方公里，居住78871户，共390292人，绝大部份为汉族，只有太白、兴隆、金承、宽阔、联坝、大溪等公社有极少数苗族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2人。

解放三十多年来，绥阳人民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同心协力，艰苦奋斗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教卫生以及工农业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。一九八一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0063万元，比解放时的一九四九年增加2.8倍。

全县有耕地面积411954亩，占总面积的11%，其中田面积215664亩，土面积196290亩。洋川、郑场、旺草、儒溪等平坝地区盛产水稻、小麦。黄桷、宽阔、太白、温泉等高山地区盛产玉米、杂粮及薯类作物。一九八一年全县粮食总产二亿二千三百一十九万斤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.3倍，亩产从一九四九年的217斤提高到一九八一年的423斤。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、辣椒、花生、烤烟、大豆等。尤以辣椒比较有名，以色鲜、肉厚、味辣之优点行销国内，还有部份可供出口。绥阳特产“空心面条”以色白、丝细、空心、味美，具有地方特色和风味，驰名省内外。绥阳不仅物产丰富，而且地下资源也很多，铁、煤、铅、锌、银等多种矿藏，现已开采的有煤炭。

据一九八二年的统计，全县有各级大小林场65个，林地面积46万亩，牧地16万亩，果林地1万亩，森林复盖率为13%。一九八一年种茶面积8017亩，总产茶叶259万斤。随着国家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，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，丰富了市场供应，改善了人民生活。一九八一年底，大牲畜总头数59198头，生猪存栏数151921头。

全县水利电力建设事业，三十多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，到一九八二年底止，共兴建了蓄水，引水，提水等各类水利工程635处，其中蓄水工程188处，总蓄水量为3723万方，最大蓄水工程为后水河水库，设计库容1590万方。100万方以上的水库，有杨柳水、宽阔水、水洋溪、万里、莲花洞、六井沟、木水坝、火秋坝等八座小（一）型水库；灌田千亩以上的引水工程6处，芙蓉江、观音岩、龙洞坎、头道河、联光、长白大沟；提灌站（包括电灌站、机灌站、水轮泵站）共387处。有效灌溉面积18万多亩，占田面积的86%；现建成农村小型水电站46个，装机47台、发电1570千瓦，县境内10千伏高压线路180公里，35千伏高压线4公里，低压线路近800公里。农村小电站和国家电网，使39个公社通了电，163个大队解决了照明及加工等问题，占全县大队数的47%，农村用电量达573万度。

解放前工业极为落后，基本上是张白纸。解放后，工业生产有了相应的发展，一九八二年有全民所有制企业10个，县区集体企业9个，街道工业8个，主要为水泥、煤炭、造纸、印刷、食品加工及酿酒等工业。社队企业从无到有，从

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，现有社队企业72个。一九八一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704万元。

全县农机具不断有所增加，一九八一年有各种型号机具4218台件，总动力达41326马力，其中有各种型号的汽车143辆，大中型拖拉机87台，手扶式拖拉机309台。机耕面积8534亩。

解放前只有一条遵义到绥阳全长四十一公里的毛坯子公路。解放后交通事业迅速发展，公路四通八达。现有各级大小公路长度达823公里，干线长68公里，48个公社都已通车，219个大队可供汽车通行，占全县大队数的62%，全县八个区每天都有农村公共汽车行驶，为城乡人民的生产、生活提供了方便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行困难和运输全靠肩挑背驮的落后面貌。

解放前绥阳的文教、卫生事业极为落后，仅有初中1所，小学12所。解放后，文教、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，一九八二年，全县有高中4所，在校高中生1826人；中学33所，在校生11711人，中学教师632人；小学340所，在校小学生56874人，小学教师2151人。县里还办有县师范学校，县农校和县卫生进修学校各一所，为县培养专业人材。

解放前绥阳仅有一个县卫生院，医务人员5人，而且医疗设备十分简陋。一九八二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就发展到63个，其中区级医院8所，公社卫生院（所）49个。还有县防疫站、县妇幼保健站和县麻疯病康复医院。全县有病床389张，医务人员562人。大部份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，有赤脚医生287人，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

状况。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。

一九八二年，全县有43个广播站，36个公社建有广播站，占全县公社数的75%，331个生产大队有广播，使广大社员群众能及时听到党的方针政策。

近年来，城镇建设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，城镇建设的投资有所增加。县城内主要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，原来“下雨遍地泥、天晴满天灰”的破烂街道，整修成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。安装了路灯，用上了自来水。城区内新的建筑物、大楼不断落成，城镇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绥阳城破烂不堪的“脏、乱、差”的状况，使城镇人民有了一个较为舒适、卫生的工作、生活、娱乐、休息的环境。

随着工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，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贯彻执行中央“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”的国民经济总方针，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，农村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，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农业生产得到相应的发展。一九八〇年以来，社员收入有所增加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出现了“万元户”和“冒尖户”。不少的农民迁进新房，有的还添置了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收音机等日常生活用品，有的还买了电视机、收录机等，农村出现了一片喜人的景象，农民生活蒸蒸日上。

绥阳县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，自然条件较好，物产丰富。绥阳人民决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同心同德、艰苦奋斗、奋发图强，把绥阳县建设得更加美丽、富饶。

# 绥阳县近百余年来历史初探

陈兴仲

## 一、明清两代的绥阳封建社会

绥阳县城营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，即公元一六〇一年，在讨平杨应龙之乱后的次年，迄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。由于明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，在江西遣送大批汉族人民来绥阳居住，相传当时是插标为业，耕种为生。所谓耕读传家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。当时的县令詹淑在未修县城前所住的衙门，不过是一个土墙隔成的小院落，座落在今北门城外县车队目前所住的地方。当时的面积不过百把平方米。农民出工，妇女们常将孩子委托给县令詹淑看管，故民间又称詹淑为“詹阿公”。可见当时的县令在初设置县的绥阳，与民众的关系是融洽亲近的，而县令詹淑对开辟边隅，也确实有一番爱国爱民的事业心。他到任后就劝民耕种，广植桑麻。继后的县令母扬祖又进一步鼓励耕织，发展生产。母在任内的利民条约中规定：“绥邑遍地有桑，而民间伺蚕者少，不知丝之为利无穷，百日即见效验。嗣后，地广人多者，可种二百株，多种者更好；地狭人少者，可种五十株，减其数者查处。”又规定：“男人耕种贸易，固有常业；妇女井臼之外，岂可袖手偷安，务要纺绩织经以作家业。本县城内

有室者九百户，附郭有室者七百户，不论绅士民军家制纺车一架，人多二架。一月之内所出绵纱若干。本县沿门查点，三月以来，已有效验。为此通行四里（指金里、旺里、朗里、赵里，即今的八个区），一体通行。”可见这位县令积极鼓励提倡，并督促城乡人民积极发展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了。把农工商三业寓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之中，具体到绥阳县来说，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。

康熙年间，我县建常平仓于县衙大堂左右共六十四间，到乾隆三年（公元一七三八年）已积谷一千九百七十六石，到道光十九年（公元一八三九年）已增至二千四百三十石。据《绥阳县志》（民国十七年编纂。下均指此，不再注）。食货篇记载：“当日（指道光时期）户籍现虽无册可稽，然据著旧传闻较之嘉庆初年略增三倍，可云盛也。”这一点又证明人口的增殖，为绥阳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。道光十九年，绥阳有二万一千八百八十户，男女大小共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三人。

在蚕桑方面，绥阳自乾隆七年（公元一七四二年）由山东省历城县引进柘茧蚕种，翌年会报民间获茧八百万……“纺织之声相闻，柘树林荫迷道，邻叟村媪相遇，惟絮话春丝几何，秋丝几何？子弟养织之善否？”可见绥阳由明代的蚕桑饲养的传统丝蚕业之外，又引进新的蚕种，而当时的绥阳已成为生产家蚕与山蚕的主要基地之一了。

绥阳农村的传统手工业，还有造纸业。《贵州通志》载：“绵纸出绥阳为佳”、“白腻坚绵，更胜止溪，极佳者贩入蜀中，次之卖之本郡。”水纸专用水竹制成，“惟绥阳专利，其上者曰：厚水纸。”“草纸，用竹草制成，以绥阳茅垭制者为上。”还有绥阳手工盐水面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

代即作为贡品，呈献咸丰皇帝，故又称为贡面，远近驰名。

关于文教事业方面，绥阳可谓源远流长。远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汉桓帝时期，就有尹珍于旺草设讲堂的传说。到明詹淑修旺草公署，掘地得碑，故石而为之铭曰：“矫矫尹氏，生于遐荒，不圃于地，游学北方，归而设教，爰有此堂，我新其宇，其道重光，矫矫尹氏，山高水长。”詹淑又于明万历三二年（公元一六〇四年）修建文庙，提倡尊孔读经。明万历四十年（公元一六一二年）县令冯士奇提倡诗书礼乐之教，还留下《绥邑建学碑记》、《重修儒溪书院碑记》，詹淑亦有《儒溪书院存疑碑记》。存疑者，该院是否因以柳易播，柳（指柳宗元）于乾符三年（公元八七六年）入播修此书院而存疑也。记中说：“……世传如此，似非无因，遂捐资补葺旧宇，择其近院田地三十亩，授元（注）为业，并量免其杂差，俾世守祠祀无斁，寄以疑存祀，不容以疑废祀也。”文中还说：“昔刘梦得、柳子厚、李太白俱以永王璘坐罪，自贬夜郎，今播志有怀白堂、唐年谱又谓，白流夜郎即半道承恩放还，是白未入播也，而何以又有怀白堂也？堂在正安乐源乡与县属长嵌相咫尺，距夜郎几三百里，岂半道承恩即此地耶！”到了康熙二年（公元一六六三年）“绥有举人之始”；康熙八年始建遵义、桐梓、绥阳、仁怀四县学署，并置训导一员；康熙十一年（公元一六七二年）“考取拔贡，为有拔贡之始。”康熙四三年（公元一七〇二年）、“训导周公辅到任，置教谕一员。遵义知府王元弼详请遵义府专设考棚，咨部报准，试者始免跋涉之苦。”到

---

注：“元”指文中“有着年孟元者，公之后也。

世传公遗帖昔有见者，今无存矣”。

了雍正元年(公元一七二三年)陈中荣中进士,为绥阳清朝一代有进士之始。雍正八年(公元一七三〇年)“知县唐椿就前县令詹淑所设义学,改建洋川书院。”乾隆三十年(公元一七六五年)议准遵义府学额二十名,绥阳县三名。乾隆三十九年(公元一七七四年)创设郑场义学,以斗息为修室。道光三十年(公元一八五〇年)知县沈西序置宾兴膏火田种。(以上均见《绥阳县志卷九大事记》所载)。可见明清两代封建王朝为了培养封建统治的文武人材,是很重视教育的。

那么,绥阳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业等究竟是个甚么状况呢?县志食货篇中这么说:“厥惟道光末年,会际升平,国家无事,士乐诗书,农安耕凿,商贾辐辏,工艺毕兴”。笔者认为道光末年这个“末”字有误,实际上道光二十年(庚子)因鸦片战争而著名的庚子赔款,是震动全国和绥阳的大事件,怎么能说“国家无事”呢?显然这个“末”字应该是道光初年比较恰当,庚子年就是公元一八四〇年,即鸦片战争开始的一年到一八四二年被迫签订《南京条约》,史学家一致认定近代史就从这年开始,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。所以笔者将上述那段话,把“末”字改为初字,才是绥阳当时封建社会的基本情况。

## 二、绥阳封建社会是怎样蜕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

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首先得从天主教侵入绥阳谈起。天主教侵入绥阳县境,是从一七七四年开始的。他们是在雍正、乾隆年间严禁天主教时期悄悄从四川教区侵入我县的边远区(即宽阔区)的白茨坪,逾十年又由白茨坪侵入黄桷

区，特别是黄鱼江巨族王、徐二姓的入教，王柏堂昆仲全家二十余口均受洗入教，在我县富户人家全家入教中开了先例。这就是外来帝国主义势力与本地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开端。对此绝不能小看，一向尊孔读经的富户绅士突然信仰起天主耶稣来了，这是有其政治、经济的特殊关系的。从社会意识和阶级性来看，徐王二姓的受洗入教，象征着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崩溃和解体，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在绥阳城乡逐步取而代之。又十年，天主教便深入到我县的中心地区了，同时反洋教的群众运动也开始兴起，在绥阳县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斗争。第一次斗争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，正当两次鸦片战争的中间时期发生的。这次斗争是全国性的，由于法帝国主义传教士的飞扬跋扈，激起了各省地方官和人民群众的义愤，以“皇帝未准公开传教念经”为理由，绥阳县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，发生了打教堂、杀神甫、捉教民的行动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，清王朝被迫签订中英、中法《北京条约》和中英、中法《天津条约》，使中国又一次大量丧失领土主权，天主教取得了在华传教的更多特权，清政府被迫赔偿所谓教案事件的白银若干万两。这笔沉重的负担，自然又落在劳动人民身上，国内的阶级斗争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化了。后来，满清政府“宁赠友邦，不给家奴”的政策，更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恨。

一八三四年，法国贝神甫将经堂迁入县城内羊子市，由于他强占民房田地并施以暴行，激起绥阳人民的公愤，绥阳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了反洋教运动，打经堂、抓神甫、捉教友，打击了反动教会势力的嚣张气焰。继这次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后，一八五四年，绥阳县农民武装反对